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Hebeisheng Shehui Kexue Jijinxiangmu



SHEHUI ZHUYI
HEXIN JIAZHIGUAN
LUNGANG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论纲

田海舰 邹卫 著

本书以对空想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为起点，系统总结和分析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挖掘梳理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艰辛探索、理论贡献及经验教训，概括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分析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充分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紧迫性和可行性，详细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原则和基本途径，重点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理分析与现代建构，展望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前景。

 人民出版社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河北省教育厅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Hebeisheng Shehui Kexue Jijinxiangmu
Hebeisheng Jiaoyuting Xueshuzhuzuo Chuban Jijinzhu



SHEHUI ZHUYI
HEXIN JIAZHIGUAN
LUNGANG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论纲

田海舰 邹卫◎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庆群 张 立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田海舰 邹 卫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

ISBN 978-7-01-008596-8

I. 社… II. ①田…②邹… III.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2249 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

SHEHUIZHUYI HEXIN JIAZHIGUAN LUNANG

田海舰 邹 卫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

字数:22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596-8 定价:4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

——田海舰、邹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序

清华大学教授 万俊人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决策，距今已近四年，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逐渐成为当今中国理论界的中心课题之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和教育部等部委连续三年将此课题作为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委托课题举行全国招标，表明党和政府对该课题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动的政治意图。为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问题变得如此显要？如何看待和理解该课题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又如何从理论上科学地研究这一课题？是所有关注并志愿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人都需要明确的前提性问题，非如此很难真正科学地把握和研究好这一重大理论课题。

—

让我们首先来尝试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即为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变得如此凸显和重要？理论问题根本是社会生活现实实践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集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

中反映。任何一个理论问题之所以演变为具有重大或核心意味的时代课题,本质上是由于社会生活的现实实践和历史发展本身提出来的,常常具有极为紧迫的现实急迫性和思想时代感,有时甚至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核心价值观问题首先是由 30 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所提出的时代性课题;其次,它也是由 60 年中国社会主义艰难探索、曲折发展、不断创新的独特经验所集中反映出来的关键性课题;最后,它还是由近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诞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和实践运动所累积起来的历史性课题。只有至少从这三个不同的历史视阈来看待这一课题,也就是从社会主义的当下中国实景、中国历史中景和长远的世界历史远景,多层面、多视角、多方位地来审视这一课题,才能具体而不失全面、深入而不失系统地把握好这一重大理论课题的研究方向。在此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课题研究首先必须具备多视角、多视阈的交叉和融合,在一种历史与现实、世界与中国的历史交融视阈中,看待、确立和把握这一重大课题的历史方位和社会意义,由此推出的第一个结论性论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研究,首先是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理想或理念,“社会主义”同其他各种关于人类社会的“主义”一样,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持续不断的思想脉络。“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公元前四百年前后,古希腊哲人柏拉图便在其《理想国》一书中较为完整地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的社会蓝图,提出了财产(富)公有的社会制度设想。柏拉图的“理想国”设想是极具想象力的社会乌托邦图像,尽管它因其过度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始终受到后人的诸多诟病,仍然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各种想象和设计。随后的希腊化时期,随着罗马帝国的不断扩张,罗马帝

国的政治领袖和哲学家、思想家们对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的想象和期待有增无减,因此有斯多亚派的“胸怀全球的人道主义”(美国哲学史家梯利语)和尼禄皇帝的“世界帝国”理念。基督教化的中世纪虽然放弃了对世俗社会的理想想象,但这种放弃不过是移置的同义语:关于人类社会的想象被移置到了“彼岸”和“来世”的天国,被以神化的方式描绘成了诸如“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天使之城”甚或“天堂”。16世纪到19世纪初,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将基督教的“天国”和“上帝之城”还俗为具有深厚政治伦理意味的世俗社会理想,从16世纪的莫尔、康帕内拉、闵采尔、温斯坦莱、维拉斯,到17—18世纪的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再到19世纪初叶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思想家们从未停止过对于人类社会理想的探寻和思索。他们(或许所有人类)似乎始终确信:人类社会绝不可能停留在某一实在状态,而应当朝向某种更为合理、更为公正、更为美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直到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从一种“社会想象”甚至社会理念的“幽灵”变成了一种科学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并开始在欧洲演变为一场持续不断的社会实践运动。通过创建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分析,特别是通过对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要素关联)、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分析、资本(主义)及其社会运动的历史批判,得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经由社会主义朝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结论。“社会主义”不再只是一种社会理想或社会想象的预期,而是一种具有其内在社会规律的发展必然。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才获得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理论指导。如果说,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理论转变,那么,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则通过率领俄国无产阶级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战斗,使得马克思的科学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

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破天荒地变成了社会主义现实：“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第一次在人类世界的真正实现。

但是，如同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理论和社会实践运动一样，社会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实践胜利仍然属于探索性、试验性的，这其中，既有大量成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发展，也有许多令人惋惜和痛心的挫折和教训。历史的记录表明，俄国社会主义实践曾经创造过史无前例的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政治平等，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和农民政治变革；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世界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诸多伟大成就；等等，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历史的事实。这些事实表明，至少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宏观管理和发展层面有其独特的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优势，也正因为如此，一些经济学（史）家、社会学家和不抱偏见的政治学家们发现，苏联社会主义的许多成功经验实际上直接或间接地被不同程度地引入欧美国家的福利资本主义改造之中，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价值资源。

同样无须讳言的是，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实践运动和社会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无论是老牌的俄国社会主义，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先后都遭遇到严重的挫折甚至失败，尽管我们不能同意诸如福山一类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关于“历史终结”的武断结论，可是，以原东、西德之间的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冷战”之终结，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受挫。现代人类世界的东西方“两极对峙”局面不再存在，东欧社会主义诸国、随之是老牌的苏联（俄国）社会主义国家先后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迫“改变颜色”，它们中的许多国家甚至争先恐后地投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20世纪后期仿佛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末期！

然而，沧海横流依旧有磐石般的坚守和独立自主的探索：社会

主义的中国在同样经历过十年“文革”等重大挫折后,仍然选择了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道路,所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因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挫折乃至失败而选择放弃,而是通过反思和总结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得出了“坚持改革开放”、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语)的结论,“后文革”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证明,这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并具有远大发展前景的正确道路,也是中国能够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理由。“坚持”不仅仅系于一种社会理想信念,而且也源于甚至更根本的是基于我们成功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特色”优势。一方面,我们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确信毛泽东主席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正确结论,在迄止1949年的近百年的历史遭际和沉浮抗争中,中国人民在各种各样的社会诸种“主义之争”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因为它不仅通过诸如共产党所领导的“苏区”之革命和建设实践获得了普遍积极的实践证实,因而也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普遍认同和政治确信,而且也通过前30年的实践探索获得了大量真实的社会实践经验和证明。另一方面,同样是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我们找到了受挫和失败的根源,以及更为重要的是走出某些社会困境、改进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创新途径,并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学习的胸襟和不断改进、探索、创新的勇气,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我们承认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内在缺陷(如:社会经济持久发展动力和效率的缺乏),承认并乐于学习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经验(如:持久高效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和效率、高效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充分普遍的交易能量,等等),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并通过不断的试验和探索——以“办经济特区”为范例——逐步改进和完善这一崭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30多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尤其是在多次区域性和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卓尔不群的优异表现,使中国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

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运动中的成功典范。

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成为“科学”,因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那么,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则标志着社会主义从科学的理论成功地变成了人类社会的现实;如果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曾经为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运动提供了最初的范例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教训,那么,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实践,则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乃至非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种根据本国国情、走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的成功典范。尽管我们并不认为今天的“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必定具有普世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社会意义,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它是中国人民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探索所找到的一条适合于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因而是我们应该且必须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地、辩证地反省世界社会主义的观念史和社会史,尤其是科学地反思和总结6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和30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是我们正确认识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这一时代课题及其重大意义的基本前提和基础。

二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理解,首先是对社会主义及其历史发展演变的历史把握和科学认识。在这一背景把握中,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两个30年或者两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历史阶段,乃是关系到我们能否且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和把握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这一重大时代性理论课题及其特殊的理论意义与实

践价值的关键环节。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

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课题？第二，在现代社会文化多元论和人们价值取向多样化发展的现实情景中，如何理解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可能？

解答第一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再次在中国与世界的双重语境中，反思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经验和教训，尤其需要通过辩证而历史地比较分析前后两个 30 年——简明起见，我们姑且大致作两个 30 年的阶段划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非如此不足以真切把握和理解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之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根本意义。

如前所说，社会主义虽然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曾怀有的一种社会理想，但作为一种建构社会的方式或者道路，社会主义的实践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始终是作为一种社会试验或者尝试而存在于人类社会理念之中的，无论是近代早期西方思想家们的“乌托邦”想象和文学艺术化的“乌有之乡”（“乌托邦”的另一个别名）图像，还是近世晚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各种“公社”或“理想国”的试验，都还只是对社会主义的预期式的社会想象，直到俄国的“十月革命”获得成功，才使得社会主义真正成为一种社会现实。然则，如同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模式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发展路径一样，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发展路径。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的确提供了许多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但它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发展的全部可能性，更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就社会主义本身而言，无论各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怎样的发展模式或路径，都共享着某些基本的社会主义普遍原则或原理，但

这种共享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全部,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或共同理想,如社会主义的平等正义、社会共同富裕、自由民主和个人的全面发展等核心原则。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遗产、社会经济条件 and 政治背景甚至是国民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等特殊差异性和多样性,各不同国家选择、建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具体路径和方式必定有所不同,如同近代以来的欧洲各国在选择、建构和发展它们各自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所呈现的具体路径多样化和方式多样化一样。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人民在经历了近世数百年,特别是最近百年的现代化道路寻求、比较和抉择之后,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并在同国民党及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反复较量和斗争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选择、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从一开始便经受了追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还是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痛苦抉择。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不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先后同陈独秀、王明、博古及其所代表的追随苏联模式的或者基于本本主义的假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在艰难困苦的探索中逐渐创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从井冈山“朱毛会师”并创立革命根据地,到20世纪20年代末至1934年苏区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发展和严重挫折,直至延安和西柏坡时期的红色政权和解放区社会主义建设,呈现一条逐渐清晰的线索: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乎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许多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独特经验、独特模式和基本特色。比如,20世纪30年代前期所逐步认识并确定的“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苏区或解放区所实行的土地改革等根本经济制度或结构性的社会改造,都具有根本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独特特色。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经济基础过于薄弱、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及其阶段性的巨大成功的强势影响,以及“冷战时期”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制约,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总体上基本处在学习和追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状态,尽管其中也不乏中国特色的探索和创新,但在社会基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方面仍沿袭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并没有真正解决好两个根本性的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一个是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发展的持续效率或动力之间关系协调问题;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并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体系之后,我们没有能够从思想和观念上(当然更不用说从行动上了)完成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转变,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或思想的“斗争”始终占据着中心地位,“抓革命”一直是优先于“促生产”的第一社会目标。客观地说,这其中确实有国际“冷战”政治环境的巨大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仍然是我们没有足够自觉地意识到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我们的国家从外患内战进入和平治理这一根本社会转型所蕴涵的复杂意义和发展意味,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合理有效的社会发展方式。

十年“文革”的惨重教训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民经济滑向“崩溃边缘”的严峻事实,促使我们党和国家对前3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作出了深刻的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反思和重大战略性调整: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原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决策,从而在根本上找到了一条开创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邓小平同志将之概述为“坚持改革开放”,“走我们自己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其根

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价值理想。然而,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绝不是也不应是甘于贫穷的低度平等;而共同富裕的理想必须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物质技术之基础上,才有可能最终得到实现,免于社会乌托邦的空想命运。更何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预期,社会主义应当获得并保持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充足强劲的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生产水平。我们党和我们的人民之所以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目的绝不是为革命而革命,而是为了推翻不平等的非正义社会,建立一个能够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谋幸福的平等、民主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如小平同志所讲的那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解决好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物质技术条件,乃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之社会价值理想的先决条件和前提性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科学的认识,我们党以开放的姿态,选择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发展道路,它既不同于既有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后者被实践证明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理想化的社会经济体制形式,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为它始终没有放弃社会平等、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这些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相反,它为实现这些崇高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目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效合理的科学手段和物质技术条件。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成功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革命”转向“建设”、从一种仿效和摸索式的建设转向一种自觉的和创造性的科学发展,如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一样,都具有根本性的社会转型意义,因而其间所包含的复杂、艰难、曲折甚至反复都是难以想象却又是可以合理理解的。如果说,社会政治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重新确立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成功地完成从“革命”转向“建设”之社会转型的根本条件,那么,从“仿苏式”的建设到独立自主的探索、再到创造性的发展,正是我们党领

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所走过的历史轨迹,在其中,最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创造性变革实践尤其值得关注和总结,因为这一阶段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为成功最为快速的3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坚持和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使之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社会主义典范的关键时期。因此,深入而科学地总结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社会经验并给予其科学的理论阐释和证成,直接关系到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是否到位、是否完整、是否深刻和本真的现实基础。

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苦探索。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会师再到闽赣苏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社会根本变革试验,都包含了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力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努力。然而毋庸讳言,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其西方发源地和苏联的传播、运用过程本身充满着多次反复和偏向——如,“第二国际”和苏联激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过度诠释,整体上占据压倒优势,更由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采取了简单接受和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所谓“左”倾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以及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国际政治环境和随后计划经济的失败与多次政治运动的周折,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真正进入快速健康的发展轨道,从而也才获得较为充分的实践证明。换言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之现代化模式的清晰而完整的呈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开创性地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提出并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

发展的经济动力和社会生产效率问题,为实现社会主义公正平等和共同富裕的基本价值理想,找到了一条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之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善和加强中国共产党这一执政党的建设、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诸多重大社会课题入手,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经济全球化、新一轮科学技术转型和生态环境变化等世界新格局新形势,大胆提出了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思路,并通过不断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均衡发展战略等重大战略性社会举措,提出并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科学发展观,从而形成了具有全方位、高目标和长远景的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自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努力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而且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以不断追求社会主义平等正义和共同富裕、努力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科学发展为核心目标和基本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日益清晰完整的呈现。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理论决策,而且明确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概括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一概括实际上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主要构成要素,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政治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价值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爱国主义与改革创新;而与之相适应的基本道德价值观则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然

而,这还只是一个纲领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概括,还需要给予系统详尽的理论论证和充分有效的学理支持。依我私见,任何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和思想宣传,都还需要从社会意识形态理论或文化价值观念学的基础支撑,非如此不足以成为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共识。在此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本身的重新认识,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构建,这是“后文革”时代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以来所面临并且急需完成的一项重大的社会意识形态重建工程,在我们已然基本成功通过社会主义改革的重大社会转型期之后,这种思想和文化精神的重建工程已经摆上议事日程,刻不容缓。

将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重建的地位,绝非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简单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而是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道德和价值观念之社会建构本身的客观要求。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后文革”30多年来社会思想、文化、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发展状况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关键时期:针对十年“文革”乃至新中国成立前30年里“左”倾思想的消极影响和严重社会后果,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大胆提出“解放思想”,创造性地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实践,这无疑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具历史变革意义的伟大创举。随之而来的一项同样重大的现实使命是,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文化、道德和价值观念体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社会意识也以其独特多样的方式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或层面影响甚至左右社会存在的变化面貌、变化方式和结果。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性转型之后,调整和建构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道德和价值观念体系,便成为我们刻不容缓且更为复杂艰巨的任务。应当客观地说,这一任务才刚刚开始,

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之国策的持续实施,我们的社会生活世界不仅产生了各种各样前所未有的新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观念,而且各种各样来自异域文明和文化系统(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社会思潮、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观念,也开始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世界里大化流行,各显千秋。还是应当客观地说,这些来自域外的思想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并非都是有害无益的,它们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也并非都是毫无价值或只具有消极价值的。“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任何一种健全的、富有生命活力的思想、文化、道德和价值观念,都必定是能够充分应对各种不同思想、文化、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挑战,并在同它们的相互竞争中脱颖而出、持续有效的思想、文化、道德和价值观念体系。“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道德和价值观念体系应该且必须是能够经受各种不同思想、文化、道德和价值观念体系的挑战,并且能够在“多元文化”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思想体系、文化体系、道德和价值观念体系。我们既要尊重文化多元和文化他者,不能孤芳自赏,也要学会独立自主、甄别良莠善恶,保持思想文化的自觉性和自主性。重要的是,如何在人们价值选择取向日趋复杂多样、社会文化日趋多元歧义的情况下,正当而有效地整合社会的思想意识、引导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取向?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里,解答和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方法,不是思想文化强制,而是也只能是通过有效地寻求社会公共理性和政治共识,通过保持和发扬本民族优秀的社会思想文化传统,包括儒学主导的中国文化传统、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优秀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传统(譬如说,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革命道德”、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斗争经验和思想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等等,及时科学地总结 30 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成功经验与失错教训,形成一整套科学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总结出